

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 “数字化”困局及突围

闫 闯¹ 蔡志良²

(1. 岭南师范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2.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作为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教育学裹挟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入理切情,但须厘清何为教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基于学科性质视角,教育学的非自然科学性,决定了价值理性在其学科建设中的根本地位,故而评判世界一流教育学建设不可完全纳入客观指标的序列分区。世界一流教育学建设中人性维度和文化维度展示出来的主体性、目的性、建构性和多元性,难以表征经由比较思维、竞争原则、计量指标和硬性标准所生成的“世界一流”,进而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容易陷入“数字化”的时代困局。若想突围“数字化”的时代困局,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一定要高于对“世界一流”的追求,同时正视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彰显学科发展的独特价值,深耕人文价值和社会文明。

关键词: 世界一流教育学; 世界一流学科; 一流学科建设; 学科性质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9)06-0024-05

启动“双一流”建设,不单是褊狭于整体性和抽象性的顶层设计,更应当在具体的学科发展和学科定位中信受奉行。作为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教育学学科建设理应追求成为世界一流。在当今时代,“一流”往往表现为一种分级评判,在形式上将量化评价标准的生成数据作为评判结果。世界一流的教育学可以是基于比较的评判,追求世界一流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却容易异化为一种单纯的竞赛或评比,跌入数字化的深渊,背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此情况下,教育学学科应该追求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吗?基于学科性质的视角,本研究通过阐述教育学学科性质,显明何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学学科建设,并从理论逻辑上剖析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面临的“数字化”困局,最后提出“数字化”困局突围的方案。

一、“学科三分”视野下的世界一流教育学

世界一流大学是以世界一流的学科建设为支撑,世界一流的学科建设助推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因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造就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由此观之,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设计与实践,绝不能是空洞的、抽象的,必定是实在的、具体的。它应当理解为“全方位地推进某一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发展过程”。在此意义上,推进世界一流教育学建设势在必行,但其重要前提在于“何为教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

1. 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争论

从学科性质的视角来看,在林林总总的学科中,整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科学等三大门类^[1]。在“学科三分”视野下,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便意味着全面地推进自然科学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科学的卓越而有效发展。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教育学属于“何种科学”?这对于客观看待教育学学科何以建成世界一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教育学的学科归属既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历来存在争议的重要命题。国内外学者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主要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科学等三大论争阵营。

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阵营的研究者认为,“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人的发展”是教育学发展的最终归宿,“人的哲学”是教育学发展的理论根基,这“正是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之缘由所在”^[2]。教育学属于社会科学阵营的辩护者坚称,教育是一项社会行动,教育现象是人在教育世界中的个体社会化与社会个体化之交合体现,以教育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实属社会科学^[3]。教育学属于综合科学阵营的支持者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教育学最初产生于人文科学,后来转向且主要发展于社会科学,20世纪中叶之后走向综合科学”^[4]。更有学者论证道,“研究教育事业现象的宏观教育学,其学科属性明显倾向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活动现象的微观教育学,其学科属性当属人文科学;综合而言,教育学属于

收稿日期: 2019-03-06

基金项目: 岭南师范学院博士专项“公民身份视域下公民德性教育的原理与方法研究”(编号: ZW1810)。

作者简介: 闫 闯, 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 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 蔡志良,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教育伦理学。

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5]不难看出,教育学的学科属性是复杂的,更是变化的。

2. 教育学的非自然科学性

研究对象是决定学科性质的关键要素。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是教育学界的基本共识。从这个意义来看,教育学的研究客体是“教育”,教育学就是专门研究“教育”的一种科学。“研究客体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教育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常出现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际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不能完全按照构建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方式来构建教育科学”^[6]。换句话说,即使教育学学科归属存在争论,但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摇摆之间,教育学的学科归属争论印证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学的“非自然科学性”。

由于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导致隶属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也不同,因此,所谓的世界一流学科的标准和范式亦不同。自然科学是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的研究之学科知识;社会科学是对人与物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之学科知识;人文科学则是对人、人的特殊性进行研究的知识体系,它侧重关注和探索人本身、人的精神、人的生活的意义。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特性来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是相对独立于人的客观的物质、现象和事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人和人事组成的社会,历史的或现实的社会兼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品性。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和个体的)及其文化产物,把主观精神或思维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自然科学的事实是客观的‘硬’事实,它一般可以证实或证伪经验定律或命题。人文科学中的事实是主观的‘软’事实,一种见解无法用它证实或证伪,各人各派的学说很难取得一致或共识。社会科学的事实或资料有‘软’有‘硬’。”^[7]不难发现,自然科学是注重“外求”的学科,非自然科学是偏向“内求”的学科。前者讲究客观标准,追求体系规范;后者强调主观意义,探索良善生活。所以,自然科学有标准,非自然科学无定式;自然科学坚持工具理性优先,非自然科学恪守价值理性优先。

“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的命题,决定了世界一流教育学的发展绝对不能仿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和范式,绝对不能重视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应当聚焦价值理性而兼顾工具理性,应当在参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带有自身的独特学科价值。

3. 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表现

教育学的独特学科价值是什么?这取决于“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最抽象地讲,就是培养人”^[8]。“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意味着教育学是“成人之学”,教育学脱离不了对“人”的观照。因此,“普通”的教育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根本表现,就是其是否真正做到解放人、发展人、提升人,是否真正做到为人

谋福祉。一言以蔽之,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实现及其程度,是形成世界一流教育学的主要标志。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是“人性”,也可以说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的价值乃是形成世界一流教育学之“人性维度”。

人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个人其实都是历史社会脉络的一部分,社会制度与责任关系并不是凭意志创造出来的,我们只是恰好生于其中,长于其中”^[9]。马克思也认为,人“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0]。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实现,同样地指向对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意义。教育对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意义体现及其程度,遂成为世界一流教育学的又一标志。文化作为“类的存在物”,社会群体的类生活的结果,它是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根基,由此可以认为,教育对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意义乃是形成世界一流教育学之“文化维度”。

总的来说,所谓世界一流的教育学就是凸显出教育学本身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彰显“人性”和“文化”的价值力量与意义体现。“学科三分”视野下的世界一流教育学分析同样表明:教育学的非自然科学性规定了其学科中的事实,不是完全客观的“硬”事实,而是以主观的“软”事实为主,坚持价值理性优先。这决定了价值理性在其学科建设中的根本地位,但是以主观的“软”事实为主的教育学学科建设,在争创世界一流的发展过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遭遇。

二、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数字化”困局

当今世界“全球化壮大了市场的力量,也将竞争原则的比较思维泛化到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在内的非产出性行业,‘一流’及其所对应的‘处于序列前列’,被泛化为众多大学的新的生存原则和发展动机”^[11]。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往往畸形地表现为一种分级评判,在形式上将量化评价标准的生成数据作为评判结果。“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综合起来”^[12],导致“数字成了一流的‘纲’和‘目’”^[13],也即是“一流即数字”——得分高者得一流。比如,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大学排名榜与学科排名榜,皆是指标体系下的量化结果。

数字有大有小,简明且直观。“一流即数字”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比较思维,遵循的是一种竞争原则。而比较和竞争的前提性条件,乃是具备计量指标和硬性标准生成的量化数字。将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作为根本表现的世界一流教育学,在得分高者得一流的“数字化”背景下,容易丧失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步入单纯追求量化指标与院校排名的数字深渊。因此,被困在“一流即数字”的理念中,非自然科学的教育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面临一种“数字化”困局。尤其是世界一流教育学的人性维度和文化维度展示出来的主体性、目的性、建构性和多元性,难以表征经由比较思维、竞争原则、计量指标和硬性标准所生成的一流,二

者之间存在难以消弭的悖论。

1. “一流即数字”的比较思维导致教育学发展“功利化”埋没了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体性

当教育学是否称之为世界一流取决于标准化的量化数字时,一流就是一种数字比较主导下的结果。数字的大小决定了哪所大学处在世界一流之上,哪个系科处在世界一流之下。为了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赢得分数,使自己“榜上有名”且处于序列前列,多数学校的教育学学科发展容易走上一条功利化的道路。功利化主要有两点表现:一是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实用化——哪些能够提升评价指标的量化分数,哪些就是教育学发展关注的重点内容;二是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短期化——哪些可以短时提升评价指标的量化分数,哪些成为教育学发展关注的必要途径。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人性维度”显明了“人”之于教育学学科的重要性。研究“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是世界一流教育的核心要素,“人”尤其是“学生”才是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体所在。世界一流教育学关注人的成长,且指向人的幸福,为“培养人”而忧虑、运思、谋划、服务,但“培养人”不是实用化与短期化的发展结果。所谓“人的全面而自由个性发展”,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实用化与短期化反而容易与“人”的培养背道而驰。由此一来,在“一流即数字”的比较思维下,教育学发展逐渐走向“功利化”,容易埋没其学科建设的主体,进而把教育学送入“主体性的黄昏”,学生及其生命全面发展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世界一流教育学遂变成哈佛大学哈佛学院院长刘易斯眼中“失去灵魂”的一流,即在追求“一流”的错觉中失魂落魄。

2. “一流即数字”的竞争原则使得教育学发展“公司化”湮灭了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性

得高分者得一流,一流是数字比较的产物。比较思维与竞争原则是“一流即数字”这枚硬币的上下面。比较容易引发竞争,竞争反过来促进比较。竞争并不总是坏的,竞争能够促进事物的进步。各个院校的教育学学科之间的合理性竞争,有可能促进教育的整体发展,但把竞争奉为圭臬,就会引起事物的异化。在“得高分者得一流”的驱使下,多数学校的教育学学科发展迫于竞争的压力,容易置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强力之下,走向“公司化”或“企业化”的运营模式。“一流要我们认识到,大学不只是像企业;它就是一个企业。一流大学的学生不只是像顾客;他们就是顾客”^[14]。“一流即数字”的竞争原则,使得教育学发展如同公司在市场中求生存一样,把自己看成知识商品的卖主,把学生当作现代社会的消费者,为了取悦“买主”,十分在意“盈利”与“名声”。这将湮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性本质。在价值理性视野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性在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理性之人”与“德性之人”是教育的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如果教育学发展像公司那样,只顾自己的商品买卖与品牌建设,在市场化竞争中获得声名,以数字化的排名

招揽学生来消费,实现自身的“盈利”,那么,在此情形下,学生不再是葆有梦想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教育学“学店”的顾客,到此一游匆匆离去。这与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性渐行渐远。或者说,以生产开明理性主体的世界一流教育学的宏大叙事,将会淹没在市场化竞争的“公司化”进程中,一去不复返。

3. “一流即数字”的计量指标造成教育学发展“绩效化”消解了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建构性

在“得高分者得一流”的理念下,数字的生成是计量指标体系的结果。大学排名或学科排名经常是关于学生、教师、科研、声望、经费等各种指标的综合统计数据之比较。“一流即数字”观念下计量指标的发生,其后果是教育学发展“绩效化”。“数字与绩效互相关联,数字代表了绩效的多少,绩效确定了数字的多少,两者彼此交融共同体现了一流的特征”^[15]。在教育学科排行榜的盛名之下,一门心思地攀爬朝向计量指标的阶梯,将会抽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本真内涵,消解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建构性。在价值理性视野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建构性就是关注人的知识创新、实践能力、道德品质之建构理性,发展人对自然世界的反思和对自然世界的渴望,提升人适应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原理与方法,使人可以变革自然世界,把人渴望的应然世界转化为实然世界。如果教育学学科发展依据世界一流的计量指标体系的内容要求,采用绩效管理的实践模式争创一流,个人或组织的一切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实施可操作化评价与奖励,教育学学科建设势必矮化成为热衷指标计量的件件生产活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建构性终会落空。譬如,某一院校在争创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过程中,为了达到计量指标中高级职称教师的所占比例,大量地外聘教师,但外聘教师往往对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建构性毫无作为。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教授受聘成为学者和教师,而不是作为引导学生培养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的导师,大学没有指望教授来帮助学生”^[16],只是为了能在计量指标的绩效评价中生产高分。

4. “一流即数字”的硬性标准酿成教育学发展“模式化”遮蔽了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多元性

计量指标在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过程中,极易演变成一种硬性标准,换言之,只有合乎一定的指标规定,才能把“普通”的教育学发展成为“一流”的教育学。可以想象,作为非自然科学的教育学,只要把评估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计量指标看成一种硬性标准,硬性标准就会盖过教育学的学术品质,酿成教育学发展的“模式化”,遮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多元化路径。“一流不能作为‘标准’因为,一流不是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尺度,它的意义依附于其他事物。用一流飞机的标准评价一只一流的小船,这小船就称不上一流”^[17]。如果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被“一流即数字”的硬性标准牵住了牛鼻子,那么,教育学学科建设将会沦为应付达标报表的同一性操作模式,根本顾不上多元化的学科建设

方式。在价值理性视野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多元性就是立足于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文化维度”,体现教育学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民族文化性格,既含有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普遍发展特征,又含有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民族文化精神。无论一所大学的教育学在学科排行榜上显得多么领先,倘若只是硬性标准的评价结果,都终究是一种单一模式化的发展结果,毫无内在性的“精神家园”可言。在此意义上,“文化维度”将在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过程中失落,教育学流浪成为“无家可归”的教育学。

从组织学视角来看,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数字化”困局之根源,不完全是教育学本身的跟风式扭曲发展,而且关键在于大学整个内部治理模式的“锦标赛制”^[18]。受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体系的影响,无论是学科发展的制度体系,或是高校领导的政绩考核,还是教师群体的行动选择,越来越多地注重以工作实绩和社会效益为核心。这种把绩效指标奉为圭臬的学术锦标赛模式,给教育学学科的卓越发展带来极大困扰。在大学组织内部实施学术锦标赛制的氛围里,教育学发展势必关注各类评价机构的“排行榜”,重视科研而轻视育人,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让位于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工程建设,后者又以可量化、可监测的方式方法鼓励、支持、引导教育学在学术锦标赛中脱颖而出。不可怀疑,学术竞赛的竞争属性是教育学科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可以促进教育学朝向世界一流发展,但外在的、量化的绩效考核容易异化成“指标排名的‘科研竞赛’”,引导高校核心行动者走向追逐科研增长而漠视人才培养责任和使命的行动选择^[19],进而陷入“指标主义”的困境,跌进“一流即数字”的深渊。

三、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数字化”困局之突围路径

如果教育学追求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必须规避由世界一流“数字化”所滋生的教育学发展的异化风险,进而走出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时代困局。这是当今世界一流教育学的必由之路。教育学的非自然科学性决定了世界一流教育学没有绝对性的客观标准,迎合“一流即数字”并不是一件可靠之事。所以,走出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时代困局意味着一定要高于对“一流”的追求,也即是教育学学科建设不能褊狭于世界一流。

1. 正视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

从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实际排名结果来看,一门学科发展是否达到世界一流的认定标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既无法摆脱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又难以脱离客观指标的数字化局面。因此,身处“一流即数字”的时代情景里,教育学学科建设争创世界一流不能无视“得高分者得一流”的竞争结果,应当充分正视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正视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一方面,要对照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计量指标和硬性标准,评估自己的得分与名次,找出存在的差

距与弱点,有的放矢地促进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要摒弃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竞争原则和比较思维,全面深入地认识到教育学科的世界一流可以是基于比较的评判,但不能抱着竞赛或评比的功利化心态去争创世界一流的教育学。说到底,在争创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过程中,正视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既要有所尊重地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计量指标和硬性标准,又要有所批判地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的竞争原则和比较思维。在“尊重”与“批判”之间,不但处在世界一流教育学之间,而且位居世界一流教育学之上,沉静且有度地行进在追求世界一流教育学的路上。

2. 彰显学科发展的独特价值

正视量化标准的比较评判是教育学学科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征途的起程。在其之后的行进过程中,能否真正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学,不仅仅是量化标准下的高分和好名次,关键还在于教育学学科建设能不能做到充分彰显学科发展的独特价值。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作为大学所指的一流,本身没有任何所指,一流大学是一个大学理念的幻影”^[20];二是因为“世界一流学科”包含厚实的难以量化的特质。故而“世界一流学科”此术语本身无所实指,而作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学科的根本在于“教育学”的独特价值。如果世界一流的教育学依据量化指标而进行风潮式的建设运动,势必造成教育学发展在南辕北辙式的路途中与世界一流教育学建设分道扬镳。在此意义上,彰显学科发展的独特价值是教育学学科建设争创世界一流的必要行动,其直接表现乃是凸显出教育学对“人的培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3. 深耕人文价值和社会文明

在争创世界一流的过程中,教育学应该彰显学科发展的独特价值的根源,实质上是“人性”和“文化”的价值力量与意义体现。毋庸赘述,世界一流的教育学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前者是普遍性意义上的教育学,后者是特殊性意义上的教育学。“世界的教育学”对应世界一流教育学的“人性维度”,着重追求人的类生活或类生长,体现的是人类的普遍性人文价值。“民族的教育学”映射世界一流教育学的“社会维度”,侧重关注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体现的是民族国家的特殊性社会文明。因此,如果说“教育学学科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应该彰显学科发展的独特价值”成立,那么,“教育学学科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必须深耕人文价值和社会文明”同样成立。由于“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中心问题,人性化是人的使命”^[21],又由于“现代教育学与民族—国家处在同构关系之中”^[22],所以,深耕人文价值和社会文明的教育学,才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学的最终注脚,亦是世界一流教育学的最终归宿。

总之,一所大学的教育学科是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学,受损或受益的不只是教育学本身,更有人性的良善生长与国家的文明进程。教育学应该追求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吗?是的,应该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学,但世界一流的时代

意蕴告诉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面临一流本身所带来的“数字化”风险。因此,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追求的“世界一流”绝对不能褊狭于“世界一流”,绝不是谋求“大数据”意义上的量化结果后的“世界一流”,必须是深耕人文价值和社会文明的意义体现的“世界一流”。期待中国教育学发展的良好局面,既在世界一流教育学之间,又在世界一流教育学之上,在追求世界一流教育学的道路上又“好”又“快”地前进。

参考文献:

- [1][美]亨特·柯兰德. 社会科学导论[M]. 康敏,等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2.
- [2]张楚廷. 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J]. 教育研究,2011(8):3-8.
- [3][德]布列钦卡. 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 胡劲松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7-62.
- [4]王洪才. 教育学:人文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兼与张楚廷先生商榷[J]. 教育研究,2012(4):10-17.
- [5]王鉴,姜振军. 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J]. 教育研究,2013(4):22-29.
- [6][俄]克拉耶夫斯基. 教育学原理[M]. 张男星,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
- [7]李醒民. 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J]. 学术界,2012(8):5-33.
- [8]扈中平. 教育人学论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39.
- [9]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J]. Political Theory,1984(3):315-330.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3.
- [11]董云川,周宏. 可以卓越,无法“一流”——“双一流”建设语境下人文学科生长的价值困局[J]. 探索与争鸣,2016(8):23-26.
- [12][14][17][20][加]雷丁斯. 废墟中的大学[M]. 郭军,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21,24,51.
- [13]熊华军,李伟. 大学理念的解构与建构[J]. 高教探索,2011(1):20-24.
- [15]沈小蛟. 对我国争创一流大学的审思[J]. 重庆高教研究,2016(6):37-42.
- [16]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4.
- [18]陈先哲. 学术锦标赛制:中国学术增长的动力机制与激励逻辑[J]. 高等教育研究,2017(9):30-36.
- [19]王务均. 论学术锦标赛及其育人转型[J]. 教育发展研究,2019(3):55-61.
- [21][巴西]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修订本[M]. 顾建新,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 [22]董标. 教育、教育学、民族—国家同构论[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91-113.

“Digitization” Predicament and Breakout in World First – Class Pedagogy Construction

YAN Chuang¹, CAI Zhi-liang²

(1.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2.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As a discipline to study the phenomena and laws of human education, pedagogy i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world class in term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edago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nature, the non-natural nature of pedagogy determine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in i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evaluation of pedago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annot be fully included in the sequential division of objective indicators. From the human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the subjectivity, purposiveness, constructiveness and pluralism show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pedagogy are difficult to express “world class”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competitive principles, measurement index and the rigid standard. H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first-class pedagogy is easier to fall into the age predicament of “digitization”. If we want to make breakouts,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pedagogy must be relied on the following: making it higher than the pursuit of “world first-class”, facing up to the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quantitative standards,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value of pedagogy development, and showing humanistic value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world first-class pedagogy; world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subject nature